

“北平方式”：和平解放的伟大创举

■王凤春 王刚

北平为北京旧称，是一座有着3000余年建城史、800余年建都史的著名古都。在实施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平津战役中，我党我军以卓绝的智慧创造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崭新形式——“北平方式”，利用强大的军事压力，迫使国民党军迅速地彻底地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，实现了收复天津、解放华北和保护古都、减少流血的双重目的。

平津战役前的胜战态势。1948年11月，东北野战军经过50余天鏖战，取得辽沈战役胜利，歼灭国民党军东北“剿总”及所属部队47万余人，解放了东北全境。此后，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，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。南线的华东、中原野战军正在淮海战场与国民党军刘峙、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。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和淮海战役的顺利进展，使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临瓦解。此时，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面临东北、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夹击，据守平津一带的华北“剿总”傅作义集团顿成“惊弓之鸟”。在是否坚持华北这个问题上，蒋介石与傅作义各有盘算，蒋介石的意图是放弃华北、巩固江南，主张将傅作义集团撤至江南；傅作义担心南撤后，自己的嫡系部队被蒋介石吞并，遂坚持固守张家口至平津塘一线。蒋、傅二人在考虑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基础上，最后决定暂时采取固守平津地区、确保塘沽海口、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，以蒋系部队部署于北平以东，傅系部队部署于北平以西，确保在战局不利时随时南撤或西退。

针对傅作义既想守又想撤的矛盾心理，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，以实现将傅作义集团扣留并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。中央军委会同东北野战军、华北军区指挥员研究筹划，确定平津战役的基本方针：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平、津、张地区，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，切断其南撤和西退通路，而后先打两头，后取中间，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全歼傅作义集团。无疑，扣留傅作义集团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争取时间，是战役最关键的一环。为此，中央军委作出5项部署。一是华北军区第1兵团暂停进攻太原。二是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回归绥，包围张家口，切断傅作义集团向绥远逃跑的道路，以免因攻下太原、绥远而迫使北平、天津之敌感到孤立，进而撤退逃跑。三是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，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，牢牢困住傅作义集团。四是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。五是



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。



平津战役中，我军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爆破天津城墙。

与傅作义保持接触谈判，稳住傅作义集团，解决蒋军。

掌握战与和的主动权。遵照中央军委作战部署，“留傅”之后要“困傅”，东北野战军、华北军区部队先从西线发起攻击，引敌西援。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在华北军区部队协同下，采取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、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，由西向东，巧妙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，切断其南撤、西退之路，使傅作义集团由“惊弓之鸟”变为“瓮中之鸟”。

在东北野战军、华北军区部队的联合行动下，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包围于张家口、新保安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5个孤立地区，我军处于“打”有把握、“谈”有条件的有利地位。然而，掌握50余万兵力的傅作义集团仍以为有有力可恃、有路可走，对和谈、起义长时间处于试探游移、犹豫拖延之中。

为使北平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、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，中央军委巧妙地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方法解决北平问题，即“以打促和”。军

事行动上按照“先打两头，后取中间”的指导方针，先打新保安、塘沽，再打张家口、天津，最后拿下北平。

1948年12月21日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向被困于新保安的国民党军第35军发起攻击，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仗。23日，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对张家口守敌第11兵团发起猛攻。战至24日，5万余敌人基本被我军歼灭。1949年1月14日，在天津守军拒绝和谈条件的情况下，我军以步兵、炮兵、工兵、装甲兵协同作战，仅用29个小时便攻克了这座设防坚固和守备森严的大城市，全歼守军13万余人。连续的军事打击，特别是天津解放意味着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逃之路被彻底切断，对固守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造成较大心理震撼，使他们明白防御如此严密的天津

尚经不住解放军不到两天的攻击，北平将更不堪一击。

傅作义意识到此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，于是多次秘密派人与我方接触。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，与傅作义集团先后进行3次谈判。一方面，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条件，进行一系列上层统战工作。北平地下党组织先后联系或接触多位与傅作义有密切关系的人士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傅作义，对促使傅作义转变立场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在努力争取傅作义的同时，北平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，策动傅作义集团所属部队起义。此外，北平各界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和平奔走，保卫古都、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各界共识，渴望和平解放的民意，对促使傅作义接受我党的和谈条件，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。

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。1949年1月21日，经过多次谈判与角力，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《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》上签字。同日，傅作义召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协议条款，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军将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。22日，傅作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，并以公开发布方式告知国内外。27日，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平津解放的统一口号，其中有：“庆祝北平解放！”“庆祝天津解放！”“庆祝华北解放！”31日，北平宣告和平解放。

北平和平解放，不仅宣告以平津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回到人民怀抱，还使北平古城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完整保存下来，避免了前线指战员的流血牺牲，保存了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，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，也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。

在北平解放过程中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运筹帷幄，决策领导和平解放北平，创造了将党的领导、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典范。“北平方式”的出现，是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官兵共同奋斗的结果，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重要的军事创举和政治创举，对于人民解放军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，并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、云南等地提供经验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东汉末年，袁绍凭借对兵种的灵活运用大败公孙瓒，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——界桥之战。其中，袁绍军中装备千余强弩的先登营，在此次大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弩又称“窝弓”“十字弓”，由弓演变而来，出现不晚于商周。至春秋时期，弩的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，战国时期各种弩广泛运用于军队。单人操作的弩为单兵弩，根据上弦方式不同，又可分为攀张弩、腰张弩、蹶张弩。根据作战需要，在单兵弩的基础上，古人又发明了装在车床之上、需多人配合使用的大型弩，如春秋时期《墨子·备高临》中记载的“连弩车”，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开始，为应对骑兵的冲击力，弩进一步向大型化发展，如巨型“神弩”以及后来宋朝出现的“三弓床弩”、明朝的“神臂床子连城弩”等。

无论是单兵弩还是车弩、床弩，其设计及射击原理并无区别。以单兵弩为例，《吴越春秋》有载：“横弓着臂，施机枢”，形象展示了以“臂、翼、机”为主体构成的弩。臂又称身，是弩的托柄，为木质长条状。翼是横置于弩臂顶端的横弓，为弩的蓄力装置。机是安装在弩臂后部用来控制挂弦释放的装置，可以勾住弓弦，并控制回弹，多为青铜打造，也是弩相比于弓最复杂、最具创造性的部分。

相比于弓，单兵弩射程更远、穿透力更强、更易于掌握，而且箭矢装填后无需双臂张力，射手可以专心瞄准射击，大大提升了射击效能。但由于需要较长时间装填箭矢，导致发射间隔时间较长。为此，古人从战术上采取不同步骤梯次搭配或不同兵种搭配的方式来解决。比如，宋军采取一排射击、二排准备、三排张弦的轮射方式，或者一排射击、二排准备、三排搭箭的专射方式，还有长枪居前、次最强弩、最后神臂弓的多兵种叠阵方式，均能达到连续不断射击，高效杀伤敌军的目的。在技术上，古人还设计了连弩。例如，明代有一种连发弩，称诸葛弩，其弩臂上设有可拆卸的内装10支箭的“弹仓”和拉弦开弓的手柄，把手柄向下拉，弦即被拉开，箭同时从“弹仓”落到槽槽内待发。只要操作手柄，就可完成拉弓、装箭、发射一系列动作，从而实现连续发射，并且为

解决威力不足的问题，箭矢多用毒箭。

除单兵弩外，大型床弩在军事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比如前文提到的宋代“三弓床弩”，设计了可绞动的轮轴机械用于上弦，这种强大的蓄力方式使弩的威力近则百步，远则千米，具有极强的远射击杀威力。《宋史》所载澶州之战，辽军名将萧挈凛就是被宋军床弩射杀。

元朝时期，骑兵极其强悍，弩的作用明显降低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弩同样没有逃脱被火器替代的命运。



收藏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蜀汉铭文青铜弩机。

飞雷炮：土制武器显神威

■王少亭 汪志鹏

淮海战役中，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都说最怕我军的3样东西：一是我军的战场喊话，二是我军的近迫作业，三是我军的“土特产”——飞雷炮。飞雷炮由于威力巨大，碰上它非死即伤，在敌军中“名声远扬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军的武器装备与国民党军相比，明显处于劣势。为弥补火力不足，前线指战员创造性地利用火药和炸药的威力，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的土制武器，飞雷炮便是其中之一。飞雷炮（又称“土飞机”），即炸药包发射筒。它的结构相对简单，但制作过程十分讲究，先将汽油桶顶端盖铜掉，再把桶身呈45度角放置或部分掩埋在土中，在桶的最底部装填黑火药或低威力炸药作为发射药；依据射击距离和火药重量，把捆扎成圆盘形的炸药包放进桶中，并加入延期雷管。点燃导火索后，发射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入敌军阵地后落地起爆，一次可发射20至100公斤炸药，射程达100至200米，可摧毁阵地周围10余米的地堡、鹿砦等土木工事。

1948年11月，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，国民党军第12兵团在双堆集和附近村庄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大量地堡、交通壕，还把数百辆汽车连成一圈，用沙土装满，打造了一条核心防御圈，构成里外三层的防御体系。战斗打响后，在飞雷炮的助攻下，我军只用半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、号称固若金汤的工事群。同年12月，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第1旅第7团1营和旅特务连，配合第58团向敌小马庄和独立家屋阵地发起



△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我军自制炸药发射筒（仿制品）。
△解放军用土布和电线捆扎飞雷炮的发射药。

攻击。此次战斗，我军集中了30余个飞雷炮，在10分钟内发射1000余公斤炸药。在我炮火压制下，敌工事全被摧毁，我军全歼守敌第18师兵营，敌第342团1营大部被炸死和震昏。

这种凝结我军官兵智慧的自制炸药发射武器，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，敌人闻之丧胆，畏惧地称它为“原子炮”。毛泽东同志在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中风趣地说：“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，这就是大炮和炸药，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、土坦克，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、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？”

淮海战役期间，前线指战员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，拓展运用方式，对武器装备进行改良，并对战法进行创新，使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，发挥了不小威



力。他们用一根木质较硬、直径与迫击炮口径相仿的木棍，在一端捆扎炸药包，炸药包上安装导火索和雷管，引燃后可将5至8公斤的炸药包发射出去，威力大超过同口径的迫击炮弹。

为研发这些土制武器，我军指战员不怕困难、不怕牺牲，有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。淮海战役打响后，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韩联生负责组织研究和试验“飞行爆破”技术（即采用飞雷炮的原理，运用各种就便器材把炸药包发射出去）。在一次“飞行爆破”试验时，意外发生。一个炸药包打出后没有爆炸，韩联生奔向炸药包落点处检查原因。当走近炸药包时，他发现导火索暗作响，立即大喊身边人卧倒隐蔽。可

话音刚落，炸药包爆炸了，韩联生等7名同志当场牺牲，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克敌利器的研制成功。

进入新时代，我军武器装备迭代升级、跨越发展，新型武器不断涌现，装备性能不断提升。在淮海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，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战斗胜利、全国解放献出生命的先烈们，他们的牺牲奉献和勇于创新的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担当作为，勇毅前行，发挥聪明才智，为战斗力提升作出应有贡献。

（本文图片由淮海战役纪念馆提供）

链接历史

营渠战役

■刘其才 文斌

1933年9月，红四方面军取得仪南战役胜利后，根据地已发展到仪陇以南地区。当时，国民党军第20军占据营山、渠县、广安等地，由北向南实行纵深梯次配置。其中，敌第20军第2混成旅分布在营山以北巴中县的玉山场、鼎山场等地，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之间，成为红军继续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。

为解除这一威胁，红四方面军决心进行营渠战役，首先歼灭敌第2混成旅，而后向南发展，突破敌第20军之纵深防御，相机歼其主力。9月22日夜，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73团冒雨穿过荒僻的山间小路，以隐蔽、突击行动猛插入玉山场、鼎山场背后，一举攻克敌之险要阵地龙背岭，击溃守敌1个营。第9军另一部占领马鞍场，将当地反动武装大部歼灭。与此同时，红四方面军第30军由正面逼近玉山场，迫使敌守军南逃，在追击过程中将敌全部击溃。鼎山场之敌陷于孤立，迅即被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1师击破。随后，第4军接着向东南推进，配合第30军发展攻势。

营渠战役打响后，敌军为确保营山、渠县、蓬安防区的安全，命第1混成旅2个团驻守佛楼寺，并以第2混成旅残部及第5混成旅1个团在天池、通天场、大庙场一线占领阵地，阻止红军前进。同时，敌急调第3混成旅由南充增援蓬安，第5混成旅2个团向营山集中，

加强防守。

9月29日夜，第30军主力向敌第1混成旅发起突然攻击。指战员冒着敌军火力封锁，攀登悬崖绝壁，一举攻下佛楼寺、杨家寨，全歼敌第1团和第3团。30日，第4军第11师攻占佛楼寺以东之石桥河。第30军第30军各一部向大庙场、新店子一线敌军发起猛攻。第9军第73团在大雨滂沱之中，英勇冲入敌阵，展开肉搏，连破7道工事。该线守敌和来援之第3混成旅及第5混成旅一部，在红军猛烈打击下，被歼2000余人，余部逃向嘉陵江西岸。当晚，第9军解放营山，并于6日占领蓬安对岸之周口。第30军第90师一部从营山西北之万家店出发，占领蓬安的金甲地区。红军所到之处，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。饱受军阀压榨的当地群众，敲锣打鼓迎接红军，庆祝战斗的胜利。

营渠战役历时10余天，共歼灭敌第20军第1混成旅大部，第2、第3、第5混成旅各一部，毙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000余人，缴获大量枪支。此战，红军相继解放了营山县城及营山、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之广大地区，使川陕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。